

傍晚时分,我们来到湖南益阳的清溪村。车子穿过田畴,远远就见那片荷塘。村口那块刻着“山乡巨变山河锦绣”的石碑仍在,夕阳斜照下,影子拉得长长的。

清溪村的名声不在山水,而在文学。它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,是小说《山乡巨变》的原型地。那些书里的故事,如今又从书里长了出来,长成了实实在在的景致——现在,这里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,王蒙、莫言、迟子建等21位作家的书屋,还有清溪剧院、书香民宿。之前我来过3次清溪村,这一次,是专门为采访迟子建书屋的图书管理员孙桂英而来。

孙桂英四十出头,个子不高,脸颊白净,说话带着东北口音。她的祖籍是湖南益阳兰溪镇,长大的地方却在数千里外的黑龙江。当年,她的父亲响应号召去了北大荒建设兵团,1982年孙桂英出生在冰天雪地里。在黑龙江长到21岁,她种过地、打过工,但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变,就是从没断过读书。2003年,她在广州打工时认识了周卫华,这个小伙子来自湖南益阳的清溪村,跟她算是老乡。孙桂英记得,周卫华第一次带她回清溪村,就去了周立波故居。走进故居的那一刻,她忽然觉得很亲切,因为读过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,知道这是一位湖南作家写的黑龙江的故事。后来她嫁到了清溪村。再后来,村文旅公司招图书管理员,面试的时候,面试的人问她想去哪个书屋,她想都没想,说:“我选迟子建书屋。”原因很简单,她以前读过迟子建的书,叫《北极村童话》。姥姥家的木刻楞房子、房前屋后的菜园、江边的柳树丛、晚霞、渔汛、大雪……她说,“那里面写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情景啊。”

自从当了图书管理员,孙桂英开始

清溪的灯

关仁山

写日记。写太姥,写姥姥,写记忆里的东北风味,写从黑龙江到湖南的这条路。日记里记的大多是平常事。但是有一件事很不平常。那天上午,下着大雨。书屋进来一个女人,撑着雨伞,背着双肩包,身上的衣服湿了半边。她把雨伞收起来,站在门口,四处打量着书屋。孙桂英仔细看她——三十出头的样子,脸色苍白,眼睛红肿,神情疲惫得像是走了很远的路。那种眼神,孙桂英后来在日记里写道:“像是灯快要灭了的样子,闪着,慢慢变淡。”女人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,忽然低声说:“我不想活了。”孙桂英心里一惊。她在书屋待了这么久,见过很多人,但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遇到。她看着女人,想问问为什么,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孙桂英想了想,走到书架前,抽出一本书递过去,轻声说:“你不说,我也不便问。你看看迟老师这本书。”女人接过书,没有说话,在窗边的矮凳上坐下来,翻开书,开始读。等到雨小了,女人合上书,站起身,走到孙桂英跟前说:“这本书,我买了。”孙桂英点点头。女人付了钱,离开了。这件事孙桂英一直记在心里。两个月后,又是一个下午,她正在书屋整理图书,门被推开了。她抬头一看,愣住了,正是那个雨天走进书屋的女人。但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——脸上有了血色,眼睛亮亮的,嘴角带着笑,身边还跟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笑眯眯的,一看就是她母亲。

“孙桂英,”女人走过来,一把握住她的手,“我来谢谢你。”孙桂英还没反应过来,女人就絮絮叨叨地讲起来。原来她叫梅梅,是邻市人。孩子得了一种难治的病,花光了家里的积蓄。丈夫不但不管,还要跟她离婚。她一个人苦撑着,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,孩子的病还是不见好。那段时间,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觉得生不如死。梅梅含着眼泪说:“那本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我读完了,我一边读一边哭,哭完了又想,人家的苦都能熬过来,我为什么就不能?”孙桂英一把抱住梅梅,热泪盈眶。还有一件让她高兴的事,梅梅也到清溪村来工作了,在这里的文旅公司上班,她母亲就是过来替她照顾孩子的。

那天晚上,孙桂英在日记里写道:“今天是我来书屋后最开心的一天。没想到,一本书能救人。”书香是灯,书屋的管理员就是那个守护灯光的人。

那一年,孙桂英的婆婆中风了。儿子刚毕业,在深圳工作。爱人周卫华在清溪剧院做保安,白天黑夜地倒班,也不能指望上。照顾婆婆的事全落在她身上。每天天不亮,她就得起床。先去做饭,煮得烂烂的,老人牙口不好,只能吃软和的。喂完饭,给老人擦身、翻身、换尿布。收拾利索了,赶紧往书屋跑。中午赶回去再做一顿饭,喂完饭,再跑回书屋。晚上回去,又是一通忙乱。累倒不怕,就是心里憋得慌。晚上躺在床上,身

体像散了架,可脑子还在转——明天要买菜,要给婆婆换药,还要到书屋上班……书屋没有人来的时候,异常安静。孙桂英走到书架前,抽出几本书来,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烟火漫卷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,她抚摸着书的封面,像抚摸珍贵的宝贝。累了一天,孙桂英回到家,等婆婆睡了,就坐在灯下读书。读着读着,就忘了身边那些烦恼。

转机,是从一条消息开始的。那天,孙桂英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,说现在提倡“素人写作”,普通人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事,发表在刊物上。她心里动了一下——“素人写作”,她不就是一个“素人”吗?她想起自己的那些日记,想起这么多年读过的书,想起书屋里的人来人往。她忽然想,能不能从日记里走出来,写一些能给别人看的东西?孙桂英开始写散文了。写书屋的事,写村里的人,写自己的日子。写累了,就读书;读完了,又写。慢慢地,攒出了一篇又一篇。她给这些文章起了个总名字,叫《茶香书影》。2025年冬天,《中国作家》杂志要做一期“新大众文艺”清溪村小辑。编辑到村里组稿,听说了孙桂英的事,看了她写的文章,当场决定:“这篇我们要了。”后来文章发表在杂志上,题目就叫《我是清溪书屋管理员》。

从那天起,孙桂英觉得自己变了。以前走路,低着头,生怕跟人说话。现在走路,抬头挺胸,眼睛看着前面,无比自信。

从书屋出来时,天已经擦黑。村子里亮起了灯,一盏一盏的,像是谁把星星摘下来,挂在屋檐下。清溪的山在暮色里静静卧着,像一本本合上的书。我觉得,孙桂英不是在守书屋,是在守一盏明灯。灯亮着,就能照亮人心。同时,孙桂英自己,渐渐也亮成了一盏灯。

语言是思想的衣裳,也是说话、做文章的原料。“字字珠玑”是人们讲话、写文章的至高追求,许多人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妙,在诗文中,也在口语里。如果说诗文里面有“黄金”,那么口语里头就有“珍珠”。珍珠似的口语可以为讲话、文章增添光彩,如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,再如“喊破嗓子,不如做出样子”,这样的口语有很多。

口语没有诗文那么典雅,常常显得土里土气,但口语喻事明理之生动活泼、简洁精练,使得其往往展现出独特的优势。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,却或富含哲理,或幽默风趣,有时胜过一篇文章。

这些口语就像珍珠一般,鲜灵灵,亮闪闪,散发着特殊而持久的魅力,甚至有真理的味道。例如“真金不怕火炼”,又如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,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它们极富画面感,或教人做人的道理,要锻炼真本领;或指出做事的方法,要抓住关键和重点。它们催人奋进,发人深思,今天已经广为传播,深入人心,有的还成为名言警句。

这些珍珠式的口语,藏在菜市场嘈杂的人声里,藏在讨价还价的对话里,藏在城市街巷的闲谈里,藏在农民农闲时的唠嗑里……创造这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口语“珍珠”的人,往往是那些饱经生活风霜又充满智慧的普通百姓。不同于书面的诗文,他们有一套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,简洁明了,朴实无华,生动活泼,初听时或许觉得淡如水,细品后则感到意蕴深厚。这些珍宝,是他们感悟自己的人生或听闻别人的故事时产生的思想结晶,不华丽,却深刻。

正是这些衣裳并不光鲜、看似平凡的劳动者,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宝库贡献了众多珍宝。我们提倡讲话、写文章要“接地气”,这些普通百姓创造的口语“珍珠”,就是“地气”的载体,也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

“好宝贝”。

藏在生活深处的口语“珍珠”,不会自动跑进人们的脑袋里。那些葫芦一样漂浮在生活表面、自以为高雅的人,想破脑壳也想不出,更得不到。若想拥有这些语言的瑰宝,没有什么巧办法,只有一个“笨办法”,就是到生活深处去,老老实实当人民群众的学生,拜他们为师,向他们学习。除此之外,好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。

走进群众中间,打开捕捉口语“珍珠”的雷达,做一个在生活深处搜寻打捞口语“珍珠”的有心人。睁大眼睛,竖起耳朵,不放过每一句有特色有价值的口语,时时处处用耳听、用心记,在悉心聆听中博闻强识,然后去粗取精,加工改造,让它们变成自己从事创作的语言素材。如此下去,久而久之,必能收获人民群众慷慨的馈赠。文学艺术家们有采风的好传统,采风时,不妨多多捕捉并记录下老百姓的那些口语“珍珠”。有心人不辜负生活,生活也不会辜负有心人。

对于文艺家们来说,若是能把来自人民群众、大家喜闻乐见的口语“珍珠”,恰到好处地融入自己的作品里,那该是一大乐事和美文,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也是一种贡献。

千百年来,诗文和口语两种语言体系,各有各的味,各有各的妙,但大多数时候“各走各的道”,少有交集。一名文字工作者或文学写作者,若能打通诗文妙句与口语表达的“任督二脉”,并能运用到得心应手的程度,相信对自己的创作一定会有所帮助。

申尊敬

文思

与老丁的约定

魏术学

“2小时24分钟后到达呼和浩特。”老丁在北京一上高铁,就发来微信。

“这么快就到了?”当带着初春寒气的老丁出现在面前时,我禁不住感叹。

“那当然了,中国速度嘛!”老丁笑道。远隔千里须臾即至,是中国铁路辉煌成就的缩影,更是铁路人挂在嘴边的自信。

1996年从包头铁路工程学校毕业后,老丁被分到北京铁路局,我留在呼和浩特铁路局。送他赴京那天,我俩沏了一壶酽酽的砖茶喝,并约定以后每年要聚一次。

从此,哪怕相隔万水千山,一声召唤就会让两个人聚在一起。30年过去了,绿皮火车、动车、高铁列车递进升级。北京和呼和浩特之间的用时,也从十几个小时缩减为2个多小时。

“1998年那场雨,你还记得不?”老丁突然问。

怎么会不记得?那年大暴雨,京包线电话告急:洪水将道床下石砟冲走,钢轨悬空。抢险队连夜赶到现场,我看见老丁裹在前来支援的队伍里,浑身糊成泥团。

“那会儿你站在水里,水都漫到腰了。”我说。

他朗声笑起来:“不站咋整?要尽快开通。”

拼了7个钟头。雨声灌满耳朵。我的腰也因此落下病根,一到阴天就往外渗着疼。老丁开玩笑说,这是暴雨授予铁路人的奖章。

“2008年的雪,比那场雨还难熬。”老丁接着说。

那年腊月的雪像一床厚厚的棉被捂在铁路上。我在集宁清雪,风像刀子割在脸上。老丁说他们在张家口干了一夜,手套冻在手上,一扯,掌心一层皮就留在那冰疙瘩里了。当时他在电话那头笑,笑声被风吹散,散成满天的雪末子,落在我的心上。我们就这样走过来了。30年,雨雪风霜都沉淀成骨头里的钙,沉甸甸地压着,也硬邦邦地撑着。

“咱们对得起当初的承诺了。”老丁感慨。

我没答话,扭头看墙上,那张奖状已经发黄。抗雪灾的集体功勋章,锈迹爬上了边缘,却还沉沉地挂在那里。

老丁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,忽然说:“你那块表呢?当年你们局里奖的那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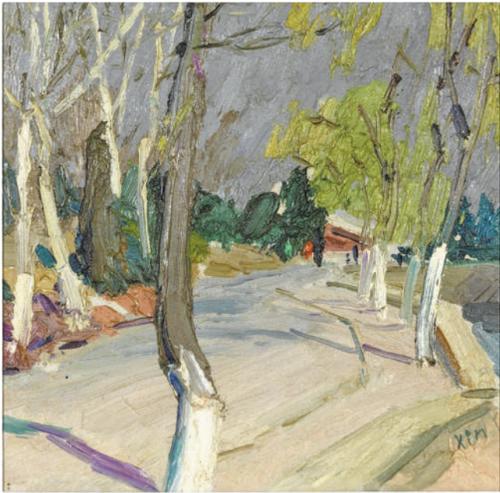
我从抽屉里摸出来。表早不走了,指针停在3点17分。是哪一天的3点17分?记不清了。但表盘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痕,那是零下30摄氏度的夜里,我想把对讲机塞进棉袄里焐热时,手抖了一下磕出来的。“还留着?”

“你不也留着那个奖章?”

老丁拿出手机,调出照片,那枚抢险奖章挂在他家的博古架上,仿佛闪着光。

不禁都摊开手。30年前,我和老丁第一次拿起镐钎时,手心磨出血泡,破了,结了痂,痂掉了后,留下一层厚厚的茧。

茧仍在。当年献身铁路的初心仍在。



《油画《新绿》,作者谨北新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当黄豆在锅里被翻炒得焦黄,豆香窜进鼻腔时,记忆中酸鲜肉的味道一下子激活味蕾,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酸鲜肉是老家黔北遵义的传统美食。黄豆炒香后磨成的粉就是制作酸鲜肉的配料。“鲜”是一种古老的腌制方法,即用米粉或玉米粉等包裹肉类,借助菌群自然发酵。黔北湿度大,环境中的菌群丰富,自然发酵的食品很独特,因此有了一系列的鲜菜。当中,酸鲜肉是我很喜欢的一道。

这道菜是妈妈的拿手菜。妈妈常常要逛好几天菜场才选到中意的肉。她总会说:“这三线肉,细细的几线肥肉夹在瘦肉中间,吃起来既不肥腻也不会太柴。”三线肉就是五花肉。

再忙,妈妈也会抽出时间做酸鲜肉。三线肉切成片,加盐和白酒腌起。用小火将米、黄豆炒至焦黄,再把花椒粒炒香。然后将炒好的米、豆、花椒拿去磨坊加工成粉。腌制好的肉要与米、豆、花椒粉混合而成的鲜粉充分拌匀。妈妈将肉放入坛子里,一边放一边压实,用笋壳、稻草或苞谷叶塞紧坛口,将坛子倒扣在盛有清水的钵钵中。

从坛子里抓出发酵好的肉,已是灰白色有点黏腻的样子。放在蒸锅里蒸,油被充分蒸出,整道菜看起来油光浸润时,就可以吃了。软糯糯的一块送到嘴里,先是微酸,然后是米和豆混合的焦香

挟裹着肉香在口里弥漫,最后还有淡淡的花椒尾香。

后来我们姊妹各自成家,妈妈做了酸鲜肉总会一家给一点。女儿到外地读书工作后,妈妈总能赶在她回来之前,把酸鲜肉从遵义送到贵阳。

女儿是外公外婆带大的,刚回贵阳时每天晚上哭闹着要回家。我说:“这里就是家。”她道:“才不是呢,这里连酸鲜肉都没得。”我只好打电话向妈妈求助,她总能让女儿的情绪平复下来。不久后回遵义,妈妈带着我做了一次酸鲜肉。临走前她一直嘱咐:“糯米与糯米按3:1混合,米要磨粗面,豆、花椒要磨细面……”我跟着妈妈学会了做酸鲜肉、盐菜肉、红烧肉,不过女儿说没有外婆做的好吃,最后还是妈妈做了送来。

时光在零零碎碎中逝去。这天接到女儿的电话,下个月休假期回来。放下电话,我便开始准备酸鲜肉。妈妈离世后,为女儿做酸鲜肉的担子交给了我。买肉、炒米、炒豆、炒花椒……坛子倒扣上的那一刻,我突然想到了已经离世的妈妈。当女儿吃到酸鲜肉时,她记忆的阀门也会打开吗?酸鲜肉的味道,也一定永远刻在了她心里。

酸鲜肉

坪奕



芝麻点缀的夜空,星斗明亮
高粱染就的枫叶——秋色无边
这些种子,曾作为收成
握在农人的掌心里
如今,长成了艺术,能把四季
凝固于方寸之间

运河作为见证者,录下了过程:
夕阳正落在屋顶
被镀上金色的粮食,回忆起
河水的润泽
它们努力地饱满,是要用一生
成为不褪色的光

粮画光阴

陈赫

水声被小镇的阡陌收纳
光阴骑着骏马
踏进五谷粘成的画卷之中
山峦,是绿豆聚集而成的苍翠
云霞,属于红豆铺就的旖旎
飞鸟欲振翅,先要画师
用黑米点睛。当粮食交出自己
运河的颗粒感,必将更加真实

大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6年前,也是早春三月的一天,天气已透着些许暖意。

邓苏生坐着轮椅,从北京辗转来到赣州找我。阳光下,轮椅的金属轮圈转动着,折射出刺目的光。

这位老人远行至此,只为一个心愿。

其时,他的残疾已相当严重,多年来几乎不再远行。这一次来找我,也是在病榻上反复思量后作出的决定。80多岁的他,因一次摔倒骨折住院半年,其间,他忽感生命如风中烛,已无暇再等待。

邓苏生说,此行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他的“八个父母”。后来,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一份“授权委托书”,请我替他记录“八个父母”的故事。

“再不抢救,就来不及了。我爸爸妈妈的一些故事,会永远消失。”他停了停,又补了一句,“那我就对不起他们,对不起党,也对不起自己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要“抢救”的,不只是记忆,更是沉甸甸的岁月,是一段历史的温度。

邓苏生的“爸爸妈妈”,是党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。他与这八位父母之间的故事,不仅离奇,而且近乎独一无二。现在,这个真实的人物,就坐在我面前的轮椅上。他的故事埋在岁月深处,等待拂去尘埃。

时光回到上世纪30年代。长征前夕,林伯渠、范乐春把刚出生14天的儿子,与战友邓子恢出生仅3天的儿子,一同寄养在江西会昌县城的堂兄范宏、堂嫂郭发仔家。郭发仔没有生育,也没有奶水,可她收下了两个红军娃。每天,她一边卖米果,一边推着两个孩子讨奶。两个孩子喝着百家奶成长。

不久,国民党军占领会昌,白色恐怖弥漫。告发红军可获赏金,那意味着,城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因揭发而得利。可成千上万人都选择了沉默。他们共同守住一个秘密——两个红军娃。

为分散风险,两个孩子被分别安置。一个留在郭发仔身边,另一个被一位乳娘带往乡村。那乳娘也是红军的妻子,丈夫牺牲后又嫁一名排工。谁知排工染上赌博恶习,一次赌

输竟偷偷将孩子卖掉。此后孩子几次被转卖,流落到洛口乡农户赖肇枝、李满姑家,被他们收养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邓子恢致信赣南军管会,请求帮助寻找15年前寄养的两个孩子。一周后,人们辗转山乡,终于在洛口乡找到因小儿麻痹症致残10年的赖平亚。

残疾的赖平亚,正是如今坐在轮椅上的邓苏生。

10多年后再见,郭发仔远远看邓苏生走来,心头猛地一震。他行走的姿势异常艰难——左掌撑住左膝,右臂用力向侧方一划,借着那股力道,整个人向前跃出一步。一步,一跃,仿佛在与命运较劲。

郭发仔心如刀绞。邓苏生原本是堂妹范乐春的亲生骨肉,自己竟在无意间将他错送他人。

这个一生以卖米果为生的米果娘,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决定——把那

此后的人生,皆以此为准绳。

两个在苦难中长大的红军娃,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的名校。他们没有被苦难压垮,反而在苦难中成才。

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邓瑞生,本可在首都安稳地工作,却在父亲支持下南迁至湖南湘潭的一家企业,作为一名普通工程师工作到退休。不是一阵子的支援,而是一辈子的坚守。他常年给会昌孤老的养母寄去生活费。养育之恩从未因身份改变而减轻半分。

邓苏生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,本也可留在首都,却在父母支持下主动申请回赣南工作,在法院基层科室一干30年。他与乡村人民公社社员刘发妹成婚。妻子和女儿都在一家小企业做工人。他把那句“15年的养育之恩,你们要终生报答”一笔一画写进了自己的人生,数十年赡养乡村的爸爸妈妈,为他们养老送终。

北京一赣州一会昌,我们立刻开始抢救式采访,脚步一直没有停歇。

邓苏生用3年多时间,把“八个父母”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又一遍。病痛煎熬中,又反复修改《两个红军娃和他们

的乳娘》初稿。

前年底,91岁的他打来了一个电话:“八个父母”与我的故事讲完了,我安心了。几天后,隔着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玻璃,他微笑着向我摆了摆手表示感谢。我也摆了摆手,向他表示感谢。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“八个父母”,是邓苏生一生独特的苦难和财富,也是他一生难以放下却终于放下的心结。

当年喝百家奶长大的孩子,一直没有忘记这片红色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恩情。

“八个父母”

卜谷

个没有残疾的孩子还给堂妹。一念之间,再次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轨迹。

两个红军娃终于被找回,却阴差阳错地“掉了包”。

邓苏生在邓子恢、陈兰身边生活了4年。后来被多位老红军认出端倪,才被甄别。于是,两个孩子各回各家,各自多了一个家,多了两位爸爸妈妈。

两位共和国的元勋对着两个少年语重心长地说,你们是谁家的娃娃都一样。住林家,住邓家,都一样。今后姓什么,改不改名,由你们自己决定。叫爸爸,叫伯伯,我们都愿意。但有一条要讲清楚——生你们的是父母,养你们的是苏区的养父母,是苏区人民。15年的养育之恩,你们要终生报答。

这不是简单的家事交代,而是一堂关于血缘、意义与人民的课。这些话像一粒种子,深深扎进二人心

寻访